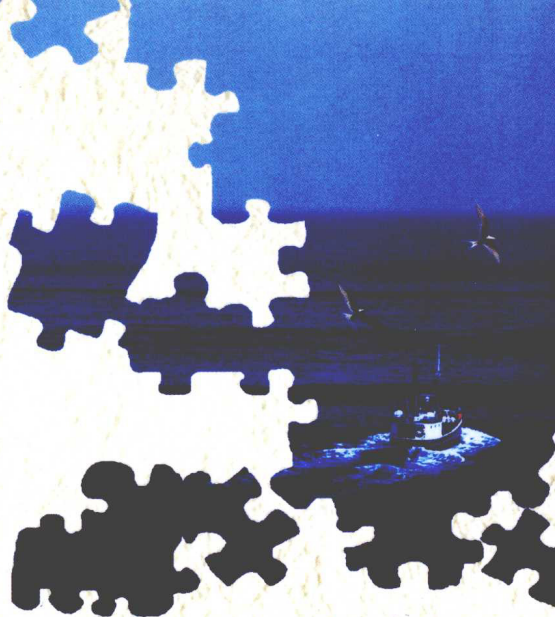


摘下中国“不民主”的帽子，
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
提出“化壑为渠”的发展思路，
探索中美两国在民主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潜力。



Democracy in China 民主中国与世界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国际战略意义

刘建飞 ◎著

清楚，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回避问题，实际上是搞“鸵鸟政策”，虽然有利于减缓当事双方在这方面
然后设法化解，消弭分歧，同时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寻求合作。如果用一句格言来形容处理“中国民主政治建
有相互将干戈指向对方，但毕竟干戈是在手的，随时可以把它举起来。更高境界是“化干戈为玉帛”。手持玉
美国要推进民主。尽管双方所说的“民主”之间有很大区别，但毕竟都是民主，本质属性是相同的，都是专制
面上的分歧，如民主的模式、道路、时间表等。如果理解了这些，双方就应该寻求在民主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不

Democracy in China

民主中国与世界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国际战略意义

刘建飞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中国与世界 / 刘建飞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04-1223-3

I. ①民... II. ①刘... III. ①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2172号

民主中国与世界

策 划: 方正辉

作 者: 刘建飞

责任编辑: 李晨曦 李淑娟

责任校对: 辛 娜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3.5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223-3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自序

本书是在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善而成的最终成果。虽然完成项目本身只用了两年时间，但本书实际上是总结了我10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阶段性研究。

我从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这个问题。动因之一是对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研究。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研究“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①。以后，我继续关注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特别是在其影响下的对华政策。冷战结束后的前10多年，中美关系一直波折不断，究其原因，除了战略上美国不再需要借助中国来牵制苏联外，恐怕主要在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不仅没有被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波冲倒，反倒随着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而快速发展，越来越强大。随着克林顿政府将“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之一，冷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也就主要表现为在全球推进西方式的民主上。中国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自然会成为美国“推进民主”的重要对象。这是客观现实，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在美国主流战略界看来，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属于“极权主义”国家，比那些君主制或军人掌权的“威权主义”国家还要可怕。如果说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都是民主的“敌人”的话，那么前者的威胁更大，因为它有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和组织力量。美国的这种外交政策倾向得到了其他西方国家的呼应。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一位领导人到澳大利亚访问时表达了发展中澳关系应当超越意识形态的良好愿望和主张，但澳国领导人却直言澳国的对外政策是讲意识形态的。

2002至2003年，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先后发表《民主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影响》（2002年第3期）、《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基

^① 刘建飞. 美国与反共主义——论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外交.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本特征与发展趋势》(2002年第6期)、《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2003年第2期)三篇论文,论述了民主问题对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影响。文章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FBIS(Foreign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Service)杂志全文翻译、转载了后两篇文章。令我略感惊讶的是,似乎我触到了研究的“雷区”。一些好心的朋友劝我“小心点”。有的关心地问:“没事吧?”有的美国学者甚至称我是位“英雄”。我理解,他们一定是以为:中国民主政治问题是个很敏感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是有风险的。将这个问题与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联系起来,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推理:既然美国和西方要推进民主,那么中国为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以及同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就应该迎合美国和西方的要求,在国内大力推进“民主化”。而“民主化”很容易与“西化”、“自由化”联系到一起。学界的反应,朋友的关心,更促使我下定了深入研究“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这一问题的决心。难道在民主问题上中国总是要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中国就心甘情愿地戴着西方扔给的“不民主国家”这顶帽子?在民主这个世界潮流中,中国难道是置身事外的?中国能融入全球化大潮,却同民主这个潮流格格不入?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不是要一直作为影响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负面因素而存在下去?

促使我研究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动因是对中美关系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有两个重要因素给中美关系带来深刻影响。一是“9·11”事件;二是国际社会热议的中国崛起。“9·11”事件促使美国将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放在反恐防扩上,为此美国需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合作。这是2001年以来中美“蜜月期”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所谓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美国又更加看中实力渐强的中国,想要借重她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美国之所以担心中国会成为战略竞争对手,主要是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还持有异议,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美国所认可的民主国家,而不民主的国家在强大后,更有可能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甚至威胁美国的安全。民主问题实际上成了影响美国对华战略信任的最重要因素。美国在判定战略竞争对手时,除了看它的能力外,还要看它的身份,看它是否有挑战、威胁美国的意愿。民主国家较少有挑战、威胁美国的意愿。不仅如此,民主国家还更容易接受美国这个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的领导,认可美国的霸权。这也是美国“推进民主”战略的一个重要逻辑。

2003 年秋至 2004 年春,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位于首都华盛顿的大西洋理事会做访问学者,着重研究中美关系在可预见时间内的发展态势。我利用这个机会走访了美国 60 位战略专家,听取他们对中美关系的看法^①。受访专家可以分成四个流派:自由派,基本上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如布热津斯基、托尼·雷克;务实派,多为共和党的支持者,如基辛格、斯考特罗夫特;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米尔斯海默为代表,其观点比较受军方的欢迎;新保守主义者,以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盖瑞·斯密特为代表,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影响较大。在“推进民主”这一问题上,务实派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不太强调“推进民主”,不赞成将“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如果讲“推进民主”,也主要是作为实施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而自由派与新保守派都比较强调“推进民主”,主张把“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甚至是最重要的目标。在访谈中,属于自由派和新保守派的美国专家几乎都把中国民主政治作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他两个流派的专家虽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但也承认,如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有了明显的进步,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我的专著《大博弈》^②系统探讨了中美关系中长期的发展态势,梳理了影响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第六章“中美对抗:不是没有动力”中,我用一节专门论述了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民主政治上的对立及其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当美国在判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民主和平论”已经成为冷战后美国各届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就目前来看,中国的民主政治状况与美国的期望值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这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一条鸿沟。

对中美关系的研究使我强烈意识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是将中国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结合在一起的重大问题,双方存在着互动性,可以良性互动,也可以恶性互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但发展进程如何会影响中美关系;反过来,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关系的状况又会影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① 全部访谈内容登载在《亚洲论坛》2005 年 9 月号,总第 126 期上。

② 刘建飞.大博弈:中国的“太极”与美国的“拳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既然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就不应当因其“敏感”而回避，而是应当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这个问题的本来面貌搞清楚，找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办法。回避问题，实际上是搞“鸵鸟政策”，虽然有利于减缓当事双方在这方面的摩擦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比“针锋相对”要好，但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姿态。最好的姿态应当是正视存在的问题，搞清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点和共同点，然后设法化解、消弭分歧，同时在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寻求合作。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处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这一问题的姿态选择和战略思维的话，那应当是“化干戈为玉帛”。目前在民主问题上双方是对立的，都手持干戈，只不过对立双方从战略上考虑没有将干戈指向对方，但毕竟干戈在手，随时可以把它举起来。更高境界是“化干戈为玉帛”。手持玉帛就不会让人感到有威胁，而且必要时还可以将玉帛展示给对方。

如果冷静思考一下，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在民主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中国要发展民主，美国要推进民主。尽管双方所说的“民主”之间有很大区别，但毕竟都是民主，本质属性是相同的，都是专制、独裁的对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都是民主的推进者，在发展民主上，双方是盟友，而不是敌人。盟友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是正常的。但那是在较具体层面上的分歧，如民主的模式、道路、时间表等。如果理解了这些，双方就应该寻求在民主问题上进行合作，而不是对抗。

我还想用一個成語“化壑為渠”來描述中美在民主政治問題上所應採取的姿態。中美關係是多維的，有經濟關係、安全關係、文化關係、政治關係（指在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關係，而不是雙方總體關係的定位，後者實際上是戰略關係）等。如果說經濟關係、安全關係等方面的溝通、交往是暢通的話，那麼在政治關係上則是不暢通的。民主問題就猶如一條鴻溝，阻礙着中美關係的發展。雙方可以繞過鴻溝，在其他方面進行交往，但這並不是最好的辦法，畢竟有一方面是不暢通的。如果把這條深壑變成一條水渠，那麼雙方就可以在渠上架設浮橋，或者行船、游泳，直接抵達對岸，或者在水上接觸、交往。如此，中美關係又多了一條溝通渠道，少了一個障礙。更進一步，雙方還可以尋求在建設、利用這條渠上進行合作。

2005年，我將“中國民主政治建設與中美關係”課題在中央黨校立項并向福特基金會申請資助成功。按照立項計劃，除了撰寫論文外，還從事了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國內進行中國民主政治新發展的調研，總共考察了10

个案例，包括山西省永济市农民协会、浙江省杭州市建立“人大代表之家”、浙江省台州市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创建民主监督委员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居民委员会建设、河北省邯郸峰峰矿区供电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浙江省温岭市民主恳谈、湖北省潜江市村委会选举、浙江省台州市村委会选举、贵州省兴义市村委会选举，其中8份考察报告发表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党校教育专刊》上；二是赴美国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问题采访美国的专家，共采访了45人，印证了我的基本思路是站得住脚的；三是组织“中国民主政治与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在研讨会上，中美专家虽然唇枪舌剑，就许多问题进行了激烈辩论，但还是达成了许多共识。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就是这些研究和工作成果的汇总。

在本书的出版编辑过程中，新世界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建议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国际战略意义，而不仅仅是局限于中美关系，尽管中美关系也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并对本书的标题和框架以及部分内容做了调整、修改。

确实，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仅仅同中美关系有密切联系，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不单是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如果将视野放宽，可以发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国际战略意义要更为深远、宽泛。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论述的，民主是当今世界一大潮流，世界多数国家都认可民主价值观，将民主看成“好东西”去追求。联合国大会于2007年将9月15日定为一年一度的国际民主日（International Day of Democracy），2008年9月15日为第一个国际民主日。确立国际民主日的联大决议案是由“新建民主政体与复兴民主政体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New and Restored Democracies）的主席国卡塔尔代表该组织提出的。中国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无疑是与这种潮流合拍的。从对外战略的角度说，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助于密切中国同那些实行民主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

当今世界格局正加速转换，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深化。但是，在有可能成为多极成员的大国中，多数是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他们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与美国有相近的立场和观念。这种共同价值观正是美欧同盟和美日同盟得以维护并加强的重要基础。许多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和巴西，实行的也是西方式的民主制度。这使得它们很容易同西方大国拉近关系，比如美国就以“世界最强的民主国家”和“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为由拉拢印

度，制衡中国，而印度也乐见这种结果的出现。印度总理辛格在2009年秋访美期间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时称：“这是统治者在中央集权体制，而不是在民主体制中实现的，并且忽略了对人权、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等价值观的尊重。”^① 其中的含义非常清楚。辛格的意思是：印度的经济发展虽然不如中国快，但却是在民主体制下实现的，因此更应该受到美国的关注和支持。与印度相似，其他实行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的发展中国家也都以自己的民主体制而自豪，并且在对外政策中有推进民主的情结。印度、巴西、南非这三个发展中大国的外长于2003年6月在南非宣布成立三国对话论坛，呼吁加强国际机构处理发展中国家关心的贫困、环境和技术等问题。西方观察家称此举等于是建立了由印巴南这三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组成的“三国集团”（IBSA，三国英文名称首字母缩写），志在成为“全球层面发展中国家发言人”。而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因政治制度差异而很难加入到“三国集团”中来。还有专家认为，这三国拥有完美的民主背景和深远的全球影响力，“三国集团”成为发展中国家发言人的努力会得到国际社会不断的支持，而美国则是“三国集团”的主要保证人。“新的三国合作可能使中国在国际事务的讨论中靠边站”，“是对中国大国野心的破坏”。^② 尽管西方的观察家和学者有可能高估“三国集团”的影响，但是有一种动向是需要关注的，那就是西方国家更愿意支持“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扩大影响力，并希望看到它们来平衡、弱化中国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在崛起进程中特别重视经营周边，将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放在外交布局的首要位置。但是，美国为了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极力拉拢亚太地区的“民主国家”来牵制、平衡中国。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到来：一个全球关系的战略框架》，试图为奥巴马政府提供一个应对中国崛起的新战略思路。其中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就是用亚洲民主伙伴关系来平衡日益崛起的中国的影响。而亚洲的一些国家对中国也日益表现出担忧和疑虑。日本在安倍晋三任首相时大力鼓动建立包括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在内的亚太地区“民主国家联盟”，其主要用意就是制衡中国。尽管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成真，但这种战

^① 中国有些过分自信的举动。印度斯坦时报网站。2009年11月24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11月25日。

^② Bruce Gilley. *Look to Brasilia, not Beijing: The rising challenge to China's great power aspira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8. 2009.

略思维仍然存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 2007 年呼吁成立“亚太民主伙伴关系”组织，就得到了韩国、加拿大、日本、印尼、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的积极响应。到目前为止，该组织已经搞了多次活动。美国还试图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内搞一个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友好成员”组织，用它来协调“民主国家”的立场和行动，进而主导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亚太国家面对中国崛起，都从主观上要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平衡中国论”就是由对中国一直很友好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提出的。中国要有效应对“亚太民主伙伴关系”的影响和美国“平衡中国”战略，除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周边外交外，还需要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同时积极参加亚太地区的“民主外交”。2008 年 12 月，中国参加了在印尼举行的“巴厘岛民主论坛”，就是非常好的举措。

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国际战略之间的关系上，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发展民主政治首先是出于中国内生的需求，而不是外部的压力，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不过，民主政治发展客观上会使中国改善国际战略环境，有利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和平崛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种全新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且惠及 13 亿人民。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世界民主政治史的一个里程碑。虽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存有偏见，对其发展前景还有疑虑，但是，随着中国发展的成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以更加客观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并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样，中国共产党也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30 年前，许多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国家成功地发展经济表示怀疑，事实证明他们错了。现在，许多外国人对中国共产党能否领导国家发展民主政治而又使自己保持执政地位仍持怀疑态度，历史将证明，他们也错了。已经追求民主 100 多年的中国人民和已经为争取中国走向民主而奋斗了近 90 年的中国共产党，一定有能力、有智慧将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好。而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更为和谐。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我的研究只是一个开端。希望这项研究成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使更多有实力的研

究者投入到这个问题的研究中。需要提及的是，我在中央党校主体班次和多个分校班次的课堂上讲授“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这一课时，学员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比较粗浅，甚至有偏颇，但这恰恰说明，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转化成思想资源，影响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其他精英分子，引导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正确的战略思维，是非常必要的。

目 录

自序 / 1

第一章 全新模式:民主中国与世界 / 1

- 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 1
- 民主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价值标尺与手段 / 2
- 中国也是民主的倡导和建设者 / 3
- 中国正致力于政治民主的探索 / 4
- 中国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全新的模式 / 6
- 什么是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的负面因素 / 7
- 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变数 / 11
- 从对立走向合作 / 12

第二章 大潮浩荡:当今世界民主化浪潮的产生根源 / 16

- 全球化进程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 / 17
- 全球化与民主价值的传播 / 21
- 全球化与全球性经济成长 / 25

第三章 顺之者昌: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态势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 29

- 世界民主政治发展态势评估 / 29
- “民主和平论”: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的理论武器 / 34
- 欧盟对外政策中的民主因素 / 37
- 民主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多重功能 / 41

第四章 追随潮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47

- 中国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 47
-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实践 / 49
- 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 53

第五章 乘改革东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成就 / 55

经济民主与社会民主 / 55

宪政民主 / 65

党内民主 / 71

协商民主 / 77

第六章 民主“大学校”:惠及 13 亿人民的基层民主 / 83

农村村民民主自治 / 84

城市居民民主自治 / 98

企业职工民主自治 / 103

第七章 明天更美好: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景 / 108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 108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条件评估 / 115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前途光明 / 123

第八章 鸿沟依旧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 126

美国的推进民主战略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 126

民主问题对美国对华战略的影响 / 141

民主问题阻碍中美战略互信的建立 / 151

第九章 携手创双赢:中美关系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影响 / 166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需要良好的中美关系 / 166

中美关系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多重意义 / 169

中美关系发展前景及其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 / 172

第十章 化壑为渠:中美在民主问题上的合作潜力 / 179

中美在民主问题上合作意义重大 / 179

中美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上合作的主要基础 / 181

中美在民主问题上可以合作的主要领域 / 184

中美在民主问题上合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 186

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中美关系良性互动的政策建议 / 188

附录一 “中国民主政治与中美关系”项目美国考察报告 / 193

附录二 “中国民主政治与中美关系”国际研讨会总结报告 / 198

第一章 全新模式

民主中国与世界

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人类历史进入 20 世纪后，“民主化”成了世界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尽管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民主都是西方模式的民主，而且在西方学者的语境中，所谓“民主”就是西方模式的民主，但是，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毕竟是历史的进步。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先生将始于 1974 年葡萄牙推翻独裁政权以来世界范围的民主运动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第三波”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亨廷顿认为有五个方面：民主价值被世人的普遍接受；全球性的经济增长；天主教会对于民主的支持；欧洲共同体、美国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政权的推动；民主国家的示范效应。

上述五个方面只是构成了“第三波”形成与发展的比较直接的原因；决定“第三波”的最根本原因是全球化。

将全球化认定为“第三波”的最根本原因，是基于民主政治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种判断，而在时间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进程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些为民主价值观在全世界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全球化使交通、通讯工具越来越发达，国家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往来的人员，电视、广播、网络、报纸、书刊等传媒手段，都成了传播民主价值的载体。同时，先进的传播技术与西方强势语言的结合，使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传播中占据优势地位。

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的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壮大了中产阶级，促进了民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从而为民主思想的孕育提供了社会土壤。从发展民主的角度看，中产阶级的职业特点决定他们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同时，中产阶级由于生活相对富裕，不会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往往能够认真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此外，作为中产阶级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分子通常有责任心和使命感，比较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亨廷顿所讲的“第三波”其他几个原因也都与全球化以及受全球化影响的民主价值传播有关。随着民主价值的传播，天主教廷如果继续坚持反民主的立场，恐怕就难以在世界立足，其影响力就会逐渐下降。实行民主政体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成功，无形中对其他国家起到了示范效应，使这些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的繁荣富强而向西方学习，包括对其民主制度的学习。欧洲国家和美国能够推行其在世界上推进民主的政策，首先是得益于它们比较强大，因为世界强国的规范、制度和价值观容易被别的国家认同。苏联戈尔巴乔夫变革之所以会对东欧产生巨大影响，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苏联是一个强国，而且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

民主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价值标尺与手段

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及其态势冲击着传统的国家与国家间关系，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了宪政民主政体，而且还出现了民主国家联合起来的趋向。《华沙宣言》和《美洲民主宪章》的产生表明：当人类迈进 21 世纪之时，民主不仅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所认同的制度和价值观，而且区域性、世界性的维护、推进民主的国际组织出现并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性的“民主共同体”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民主不仅影响着共同体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影响了联合国一些机构的运作以及联合国的发展前景。

与之相应，民主问题也成为影响大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大国和国家集团都将推进民主作为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以欧盟为例，推进民主目标不仅表现在其政策文件中，而且也体现在同具体国家的具体政策中。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民主正发挥着价值标尺与手段的双重功能。作为

价值标尺，民主价值观使“民主国家”之间的亲和力大为增强，美欧、美日同盟的存在与各方均推崇“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共同价值观”有关；同时，国际社会无形中以民主为标尺分成“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两个阵线，“民主国家”在实力及道义上占据着绝对优势，而“非民主国家”处于被动境地。

冷战后“民主和平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影响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理论之一，关键在于其迎合了国际社会对民主的关注以及背后潜藏的价值判断。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世界分成民主的和民主的两部分，只有民主的国家之间才可能不互相打仗。在这种语义背景下，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民主和平论”在冷战后已经成为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除了价值标尺外，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民主还经常被用作实现本国对外政策的手段。作为手段，民主的功能是多重的。它是维系同盟关系的纽带，是打压竞争对手的武器，是影响西方国家公众舆论的工具。冷战期间，西欧国家与美国结成联盟固然有抵御苏联威胁、维护西欧安全的考虑，但是共同的价值观也是维系联盟的重要纽带。冷战后，按说苏联威胁的消失使得西方世界失去了最重要的联合动力，再加上美欧之间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关系不应再像冷战期间那样密切。然而，共同的价值观使美欧同盟又有了新的基础和纽带。虽然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使美欧之间产生裂隙，然而，细分析起来，法德同美国的分歧并不是在推进民主这样的大目标上，而是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法德并不反对推翻萨达姆政权，而是反对美国不顾欧洲的利益、只顾自己的做法。

中国也是民主的倡导和建设者

中国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一直在追随民主这个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和民主政治模式。中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是民主的敌人，而是民主的倡导者和建设者。

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其民主政治理论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主张民主的理论，是反对封建专制的。长期以来，由于苏联等国在民主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的政治制度往往被西方看成是与民主相对立的理论体系和制度。这反映出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偏见。

中国共产党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高举民主旗帜的。1922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将中国革命的奋斗目标确立为：“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和“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称作民主政府，而且共产党边区的民主得到国内、国际有识之士的公认。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除了在社会管理上进行了民主实践外，在党内生活中也实行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自己领导的国家定性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民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

在具体实践上，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在1953年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自下而上地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更是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目标写进了党章。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也走过弯路，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搞“大民主”，结果不仅破坏了社会政治稳定，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而且民主也没有搞好，甚至还出现了个人崇拜现象。

中国正致力于政治民主的探索

改革开放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乘着改革的东风，中国民主政治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作为政治民主基础的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还是政治民主本身，中国都取得了不可忽视的进步。

市场经济是经济民主的最重要标志，也是政治民主的最重要基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伴随着市